

文學遺產

選集

一輯

文学遺產选集

一 輯

文学遺產編輯部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文学遺產选集一輯

文学遺產編輯部編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北京新華印刷分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333) 字數：228千

開本 33.5"×46"1/32 印張10 插頁 2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

定價(6)1.05元

出版說明

根据讀者的要求，为了查閱与保存的方便，我們从“文学遺產”第一期至六十期中选出三十二篇文章，（約佔發表量百分之二十八），編成这一本选集。

在“文学遺產”上，自从去年十月展開“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買办資產階級主觀唯心論的批判以及揭發胡風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以來，關於这三方面，我們一共發表了四十八篇文章，其中大都已收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問題討論集”和三联書店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因此为了避免重複过多，只选錄了四篇。

本集所选的文章中，有幾篇經過作者修改，一篇改过題目，此外都保存原來的面目。

“文学遺產”編輯部

一九五五年，九月。

目 次

發刊詞	1
在中國作家协会召開的“紅樓夢”研究座談會	
上的發言	周 揚(4)
編者的話	編 者(8)
關於古典文学整理工作的幾句話	常好問(13)
結論必須根據事實	霍 然(16)
談生搬硬套	潘 辰(21)
 評“紅樓夢研究”	李希凡(25)
藍翎	
試論賈寶玉、林黛玉婚姻悲劇的根本原因	劉秉文(39)
胡適文学史觀批判	褚斌傑(52)
胡適怎樣“重新估定”中國古典文学	馮 至(67)
 宋玉和他的作品	胡念貽(85)
說黃門鼓吹樂	王運熙(98)
關於陶淵明	王 瑤(105)
讀“陶淵明傳論”	閻簡弼(114)
李白詩歌的現實意義	胡國瑞(121)
讀“談白居易的寫作方法”	霍松林(133)
(附) 談白居易的寫作方法	李嘉言(150)
論“西廂記”	徐朔方(159)

略談長生殿作者洪昇的生平	陈友琴(169)
从“長恨歌”到“長生殿”	徐朔方(181)
讀“長生殿傳奇”	陈友琴(191)
關於“桃花扇”的一些問題	陈志憲(206)
金聖嘆批改“西廂記”的反動意圖	霍松林(218)
評阿英“元人雜劇史”	陈 健(228)

吳敬梓先生逝世二百周年紀念会開幕詞	茅 盾(239)
“儒林外史”及其作者	張慧劍(242)
儒林外史与諷刺文学	刘大杰(252)
吳敬梓和他的時代	胡念貽(262)
从明末清初科举制度看“儒林外史”	曹道衡(280)
“聊齋誌異”及其作者蒲松齡	王文琛(292)

學習苏联文学理論對於我們古典文学教学的 一些体会	詹安泰(307)
-----------------------------------	----------

發 刊 詞

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我們的文學遺產，由於很多卓越的前代作家不斷地創造和努力，也是極其光輝燦爛的。從詩經楚辭起，一直到“五四”時代新文學奠定者魯迅先生的作品為止，差不多每一朝代都有傑出的作家，在不同的文學種類中都有獨特的成就。但是，這些文學的寶藏，不僅在封建社會裏面不可能得到正確的評價，就是到了“五四”以後，它們的價值和意義也還未能獲得充分的科學的闡明。因此，用科學的觀點來研究我們的水文遺產這一工作，就十分有待於新中國的文學研究工作者們來認真地進行。

去年九月，周揚同志在第二屆文代大會上的報告中，曾經把“系統地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學藝術遺產的工作”作為“我們文學藝術事業上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提了出來。關於研究和繼承我國古典文學的重要性，可能已經沒有什麼爭論了。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有一個專門的刊物來發表研究古典文學的文章，討論古典文學中的問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我們創辦這個副刊，就是想在這種專門刊物出現之前，先來開闢這樣一片小小的園地。

運用科學的觀點與方法，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與方法，對我們文學遺產作出正確的評價，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标。然而，我們知道這並不是容易的工作；我們過去這方面的經驗還很少，必須經過不斷的學習、研究、討論，我們才能逐步提高對於

古典文学進行科學分析的能力。何況我們古典文学中的問題是十分複雜的，有許多困難的問題必須經過反覆的討論，不可能一下就作出定論。因此，本刊選載稿件，一方面以上述目標為我們的方針，努力提倡以科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我們的古典文学中的作家和作品；另一方面又必須照顧實際水平，容許發表各種不同的意見，並不要求每一篇研究文章都成為最後的結論。我們希望有些重要問題，能够在这个刊物上展開活潑的自由論辯。

“五四”以來，研究古典文学的專家們所作的工作多偏重在材料的考證方面。他們的成績在這裏，他們的限制也在这裏。直到現在不少的專家也還是這樣：他們擅長於考據，但要對一個重要作品的思想內容與其藝術成就，作出比較圓滿的分析和論斷，却感到困難。我們認為對於材料的考證和對於作品的內容的分析，應該結合起來。分析作品不能不根據具體的材料，而材料的考證和研究又應該以闡明作品的內容為目的。盲目的為考據而考據，忽視思想和理論的考據至上主義，以及過去在考據當中存在的武斷臆測的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和治學態度，我們是必須反對的。但是，材料的詳細佔有和認真辨別，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工作者也仍然是一種不可缺少的基本工作（雖然並不是他的全部工作）。因此，凡屬實事求是的、對於研究古典文学有參考價值的考據文章，我們也打算以一定的篇幅來刊載。

當然，我們願意刊載的稿件是多種多樣的，並不限於上面所說的那些性質的文字。關於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問題和方法的討論、不正確的傾向的批評，關於古典文学作家的研究及作品的閱讀的指導，關於古典文学的整理工作，關於學校中的古典文学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討論，關於交流研究工作經驗的通訊，以及關於古典文学的書評、讀書心得等，我們都很歡迎。但由於

篇幅有限，我們尤其歡迎各種短小精悍的文章。

我們希望通過這個刊物來加強全國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的相互之間的聯繫，增進研究者與讀者羣眾之間的聯繫。為了使這個刊物能夠辦得好一些，在稿件的供給上，在對於編輯工作的提供意見上，我們都誠懇地期待着全國各地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和廣大讀者的支持和幫助。

在中國作家协会召開的“紅樓夢” 研究座談會上的發言

周 揚

簡單的講一點意見：

李希凡、藍翎兩同志的批評俞平伯先生的文章，給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以至整個文學工作提出了一個新的重要的問題，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研究古典文學，首先批判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觀點。他們不是抽象的提出問題，而是抓着了了一個具體對象，執行了尖銳的批評的任務。這個批評對象，就是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紅樓夢簡論”。俞先生是一般人所認為的研究“紅樓夢”的權威學者，但這兩位青年作者不迷信所謂“權威”，他們相信的是真理，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學說。他們就用這個學說做武器，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反動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觀點，作了第一次認真的批判。本來馬克思主義就是批判的學說，它批判一切落後的反動的制度和思想，它的戰鬥性主要就表現在這裏。我們平時口頭上常常講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卻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不批判，不鬥爭，實際上就是對資產階級思想投降，這哪裏還有甚麼馬克思主義氣味呢？現在兩位青年作者作了我們文藝界許多人沒有作的工作，他們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對於文藝界的這種新生力量，難道還不值得我們最熱情的歡迎嗎？同時反過來，對於我們文藝界在思想工作上的不可容忍的落後狀態，難道還不值得我們

深切反省嗎？

近兩年來，我們進行了一些對古典文學的整理、研究出版的工作。這是很需要的。但接受遺產並不等於把書印出來就算了，正確的接受遺產當然是要用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去加以整理批判，而首先應當批判“五四”以來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觀點。在這一方面，特別應當清算反動派胡適在學術界各方面的思想和影響。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上所採取的觀點和方法基本上是承襲了胡適的，而且三十年來已形成了他一貫的思想。他雖然發表了一兩篇新觀點的文章，但那並不代表他基本的思想。現在青年們對古典文學開始重視了，但找不到這一方面馬克思觀點的書來幫助他們正確的閱讀和理解古典文學作品，於是祇好連錯誤觀點的書也去讀了。“紅樓夢研究”的銷行六版，是值得重視的。“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古典著作，而俞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又被視為“權威”，因而他的錯誤觀點就更需要加以批判，從這點說，李、藍兩位的文章就具有特別迫切的重要的意義。資產階級思想在文藝界還是相當普遍，在某些方面甚至還根深蒂固的，如果我們不用大力加以批判揭露，實際上也就是甘心做資產階級的俘虜。你不批判它這種思想，這種思想就要流行。列寧說過：“不是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就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工人階級不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思想去正確地教育青年，資產階級就用它腐朽的唯心論思想去毒害青年。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這次討論的目的，就是為的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確立起來，使古典文學的普及工作不至引導青年走上錯誤的道路。

我們是否對“五四”以來的古典文學研究的成果採取一概抹殺的態度呢？當然不是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把“紅樓夢”、“水滸

等作品提到重要地位，是正確的。但當時運動的領導者們對於這些作品的評價却包含嚴重的錯誤，反映了資產階級唯心論的觀點。現在我們要批判的主要就是以胡適為代表的那種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影響。

批判俞平伯先生，當然祇是批判他的錯誤觀點而不是要打倒他這個人。他在政治上是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是贊成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在這點上，我們是一致的。但是他的錯誤觀點，我們却不但不能苟同，而且一定要批判，徹底的批判，不批判是不對的。俞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和考據工作是否就沒有點可取之處呢？我們是尊重一個作家的勞動的，但有一個條件，這種勞動必須於人民有益。目前對於大家和對於俞先生本人，需要的不是講他在考據工作上有甚麼貢獻，而是要批判他的資產階級錯誤的觀點，他正是用這種觀點進行考據的。凡是於人民有貢獻的事，哪怕是很小一點貢獻，人民都是會承認的。

說到考據，我們並不是一般的反對考據工作，相反，我們需要真正科學的考證工作。關於作者的時代生平，創作過程以至作品中文字真偽的考證，都是需要的。但這種考據工作只是研究工作的基礎，而不是目的。我們反對為考據而考據，反對用資產階級唯心論的觀點來進行考證，反對歪曲地利用考證材料來宣傳資產階級文藝思想。近兩年來，有些古典文學研究的專家已開始嘗試用新的觀點來解釋和研究古典文學，這是應當歡迎的。他們所進行的一些新的考據工作及對於材料的說明工作，不少也還是有益的。

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無疑地將推動學術思想的進步。不久前，在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提出了在文藝界展開批評和自由辯論的問題。這幾年學術界的自由討論的空氣太

缺少了，这大大影响了学术的发展和思想的前进。这次“红楼梦”的讨论，是学术界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同时也是自由讨论的开始。我们提倡学术上的公开的、自由的讨论。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共产主义者，靠老实，靠真理吃饭，马克思主义是要事实材料作根据的，不要材料、不要根据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思想，明显的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我们就必须采取毫不含糊的明显的反对的态度。但是有关学术思想上的问题总是包含复杂的内容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明确。对于俞平伯先生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可以在一定时间告一段落，而对于“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就是一个较长期的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红楼梦”及其它古典作品，这是目前文艺界重大的任务。在这个研究工作中必然含有不同的意见，应当允许不同的意见展开自由讨论。这样，“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才可以深刻的全面的得到阐明。例如，“红楼梦”所反映的时代的阶级结构的变化，贾宝玉这个人物所代表的社会典型，作者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等都值得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之后，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也就更有效果。要从各方面来研究“红楼梦”的价值，自由讨论是会有帮助的。我们懇切希望俞平伯先生能够改正他的错误观点，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只有通过公开讨论，才能得到胜利。

編者的話

(一) “文学遺產”出刊以來，已有十三期了。截至六月份為止，本刊編輯部收到的稿子達一百八十餘万字之多。这样一个龐大的數字，說明了我們的作者和讀者對祖國的文学遺產具有極大的熱愛，同時也說明了他們對於本刊的積極支援。無疑的这是非常可喜的現象。現在，本刊自第十期起已改為週刊，今後我們的任務便加倍地繁重了，希望愛護本刊的讀者和作者們，仍舊能不斷地給我們以協助及指導。

(二) 從我們所收到的來稿看，作者筆觸所及，範圍依舊是不很廣闊的，多在“詩經”、“楚辭”、“樂府詩集”這幾部書的問題內繞圈子。我們曾經初步地做過一番統計工作，就拿三、四兩月份的情形來說罷，八十六万字的來稿中，關於“楚辭”的有八万五千字，幾乎佔總字數百分之十，關於漢魏樂府詩的有九万二千多字，佔總字數百分之十以上，而談李白的只有一万四千字，還不到百分之二。就是從上述有關楚辭和樂府詩的大批來稿中，也發現幾種偏向。那就是：第一，常常是一些對舊問題的重複，而且是一些無法得到最後結論的問題的重複。例如討論屈原放逐的年代問題和屈原作品的真偽問題等，說來說去，意見還是那些，材料還是那些，沒有什麼新的發見；如果有，又總是主觀推測多，真憑實據少，甚至牽強附會，不能自圓其說。第二，研究的範圍太窄，寫來寫去，老是集中在幾個題目上。例如談樂府詩的不是“陌上桑”，就是“孔雀東南飛”。前者總歡喜討論羅敷的身分問

題，後者則歡喜考証它的時代問題。其實這兩篇名著是還有一些更重要的方面可以研究的。因為“陌上桑”的主題並不在於寫羅敷的身分；而長期流傳人口的偉大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也很難根據其中幾個名詞或某些文字，就斷定它的寫成的時代。他如關於“水滸”、“紅樓夢”、“三國演義”、“儒林外史”等作品的論述，又多只談書中個別較小的問題，或只分析書中的個別人物，很少概括而又具體深入地分析某一整部書的思想性及藝術性。而這類文章正是目前讀者們所迫切需要的。

(三) 我們極其歡迎多種多樣、短小精悍的文章，這在我們發刊詞內早就申明過了。我們也收到不少的短稿和讀書札記。短稿和札記我們是歡迎的，但必須指出：無論短論也好，札記也好，只是篇幅小，字數少，不應該是沒有內容或者內容膚淺，隨隨便便、信手拈來，興之所至、偶然欲書的，必須是短小精悍，確有心得。因此，如果寫這一類的稿子，我們要求作者採取認真態度，多花一點勞動，這樣才會對讀者有益。

(四) 此外我們還收到一些翻譯古典詩歌的稿子。古典詩歌的翻譯，在一定的意義上也是必要的。但本刊所需要的主要還是在研究、分析、批判等方面的文章，不可能用很多篇幅來發表翻譯的稿子。就拿“詩經”作例罷，對某些詩篇，如果由於疏通證明的結果，使原文得到更確切的解釋，即使讀書札記式的短文，我們還是歡迎的。但是，毫不費力，對讀者沒有什麼幫助的翻譯，甚至把“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譯成為“可憐他被迫拿着衝鋒槍，替戰爭販子上前綫去作戰”，把“大車檻檻，毳衣如綈”譯成為“開動着的十輪卡，載着草綠色的軍裝”，像這樣的譯法，我們認為是不能發表的。

(五) 關於考據問題，我們還想特別着重談談：因為有很大

部分的來稿都是考据或者近乎考据的文章。

考据文章本來是本刊願意刊載的稿件之一。在本刊的發刊詞中，曾經這樣說過：“凡屬实事求是的對於古典文學有參考價值的考据文章，我們也打算以一定的篇幅來刊載。”我們認為考据的本身就是調查研究工作，是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过程中應該進行的工作之一。因為無論要解決任何問題，都必須詳細地佔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但做這種工作，必須採取实事求是的態度，絲毫不能摻雜個人的成見。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調皮都是不行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選集三卷，八〇一頁）又說：“要這樣做，就必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同前）這個具有經典意義的指導，雖是為對實際工作而發，但對於我們做研究工作的人，它的根本精神，是同樣也合適的。這種科學方法，我們每一個做研究工作的人都必須牢牢緊記，好好地學習和熟練地掌握。目前，我們的許多考据文章科學性顯然不夠，過去存在的缺點——武斷臆測的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和治學態度，顯然沒有克服。而這種武斷臆測的主觀主義的考据文章，我們覺得是不應該隨便推薦給本刊的讀者，以致引起他們對於某些問題上看法的混亂。

（六）其次，我們認為考据應該有明確的目的，應該服務於當前的學術研究的總方向，總計劃。過去曾經有過只是為了“考据癖”，為了矜奇炫博，或為了“鑽冷門”而做的考据；也曾有過祇是羅列材料而不能解決問題，甚至不曾提出問題的考据。這些考据徒然浪費精力而不能為祖國文化增添什麼。所謂“為考据而考据”或“純考据”，主要應該指這個而言。這不為我們讀者所歡

迎是很难怪的。

(七) 今天放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對於重要作品進行分析批判，說明其真正的價值所在；對我們的文学歷史進行研究，闡明其發展規律。而分析、研究、批判就不能不依据丰富与可靠的材料，这样，我們就不能抹煞考据的作用，就沒有理由輕視考据工作。但是，如果離開闡明作品內容与文学發展規律的目的，这样的考据在今天之不被重視和受欢迎那也是很自然的。

我們从一些讀者的意見中，又發現对考据文章有兩種極端相反的态度：有人見了考据文章就“头痛”，希望本刊越少登載越好；也有人祇承認惟有考据文章才有學術價值，其餘都屬空疏。我們不能不指出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確的。前者對於考据的作用和本刊的性質——本刊为一學術性的但同時又照顧到普及工作的期刊——尙欠了解（有些文章沒有用比較通俗的寫法，不照顧一般讀者，当然也是缺點），後者則是囿於考据至上主义的偏見。

(八) 本刊發刊詞曾說：“我們認為對於材料的考証和對於作品的內容分析應該結合起來。”也就是主張研究要尊重材料，同時又不停止於只是材料的佔有和辨別。這並不是認為每篇分析作品內容的文章一定要說明材料的考据过程，或者考据文章一定要提到对作品分析的結果。有些文章的確有些材料，只是意見还不够成熟，又有些文章虽然材料不够，而意見却頗有可取之处，這類文章我們覺得仍是可以供讀者參考的，因此我們也打算選擇登載。所以有个別讀者認為本刊曾“大量刊載純考据的文章”，如果“純考据”是指“为考据而考据”，我們覺得本刊並未大量登載此類文章。如果有人認為凡屬範圍限於考据而不涉及对作品內容分析批判的文章就是純考据文章，就反对登載，我們覺得这样的提法